

經史散論

——從現代到古典

周春健 著

本書收錄作者近十年來在經史領域問學的十四篇學術論文，作者對待經典的態度，實現了從「現代」到「古典」的重要轉變。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
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
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

繫之召公
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經學研究叢書・經學史研究叢刊

經史散論

——從現代到古典

周春健 著

經史散論：從現代到古典 / 周春健著.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2012.01
面；公分. -- (經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究叢刊)
ISBN 978-957-739-740-9(平裝)

1. 經學 2. 史學 3. 文集

090.7

100025486

經史散論：從現代到古典

2012 年 1 月 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740-9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作 者	周春健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陳滿銘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總 編 輯	陳滿銘	電 話	02-23216565
副總編輯	張晏瑞	傳 真	02-23218698
執行主編	陳欣欣	電 郵	editor@wanjuan.com.tw
編輯助理	游依玲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封面設計	果實文化設計工作室	電 話	02-23216565
		傳 真	02-23944113
		印 刷 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 路 書 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 撥 帳 號	15624015

(廣州) 中山大學 211 工程「經典與解釋：中國古典文化的多重闡釋」
項目成果

題 記

這本小書收錄了我近十年來在「經史」方面問學的一些單篇習作，題材比較散，沒有一個集中的主題，具名「經史散論」，可謂名副其實。

十四篇文章，大概可以分成三組：前面七篇討論《詩經》、《左傳》、《周易》、《孝經》、《爾雅》、《中庸》等經書的相關問題，屬於「經」的方面；中間五篇主要討論《漢志》和《四庫總目》、《續修四庫總目》等目錄學著作，屬於「史」的方面；最後二篇，則是將「經史」乃至「四部」之學放到一起討論，帶有一點綜合性質。

這些文章，有的已經發表，有的尚未發表，下面逐一作個交代：

第一組中，《左傳引詩辨析》本是我二〇〇一年碩士畢業時的學位論文，曾經單篇抽出發表於《孔孟學報》、《湖北大學學報》等學術期刊，此次收錄略為修訂，刪掉〈《左傳》引《詩》與中國引用理論〉一章及原來作為附錄的〈《左傳》引《詩》綜表〉，大體保持原文風貌；〈賦詩源流小考〉發表於《文史知識》二〇〇二年第九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指瑕一則〉發表於《書品》二〇〇六年第二期；〈朱熹與《爾雅》〉發表於《湖北大學學報》二〇〇八年第五期；〈元代《易》學著述編年〉是「周易哲學與和諧社會——第二屆中國易道論壇」（2011，廣州）的會議論文；〈元儒吳澄與《中庸》三題〉，本是「儒家思孟學派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濟南）的會議論文，後發表於《經典與解釋》第二十六輯（2008年）；〈簡朝亮與《孝經集注述疏》〉本是為〈《孝經集注述疏》校注〉寫的弁言，今略作改動。

第二組中，〈《漢志》「出、入、省」與班固的學術觀〉本是「中國文化中的經典、聖賢與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廣州）的會議論文，後發表於《古典研究》二〇一〇年第四期；〈讀〈四庫總目〉小筭〉發表於《書目季刊》第四十四卷第一期（2010年）；〈張舜徽先生〈四庫提要〉批評條辨〉是「張舜徽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三十二屆年會」的會議論文（2011，武漢），後收入會議論文集（華中師大出版社，2011）；《從徽州到漢口》，則是與崇文書局（武漢）鄒華清先生合作，發表於《湖北地方古文獻研究》論文集（崇文書局，2009）。

第三組中，〈《古史辨》第三冊〈自序〉讀笥〉是「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第三次小型研討會「修養、教化與政治哲學」（2011，臺北）的會議論文，並曾在中山大學哲學系「嶺南青年哲學沙龍」上交流；〈〈四庫總目〉「四部關係論」四題〉，則是為「經學與史學高層論壇」（2011，北京）而作的會議論文，並曾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訪學期間作過小型學術報告（2011）。

之所以把十年前的舊作〈左傳引詩辨析〉居於首，把今日新作之〈《古史辨》第三冊〈自序〉讀笥〉及〈〈四庫總目〉「四部關係論」四題〉二文殿於後，除去依照時間上的先後次序，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用意，就是十年後的今天，自己對待經典的態度與之前迥乎不同。就《詩經》而言，則是完成了從「現代詩學」到「古典詩學」立場的根本性轉變。比如在〈左傳引詩辨析〉中，我非常認可現代學者對於「經說」的摒棄和對《詩經》所作的「文學闡釋」，而〈〈古史辨第三冊自序〉讀笥〉及〈〈四庫總目〉「四部關係論」四題〉的態度則有較大轉變。我發現，從「古典」的角度看經典，一部部經書不再是所謂「已陳之芻狗」，竟然都是那樣的富於智慧和可愛鮮活！正因為此，我在書名正題後加了一個副標題——「從現代到古典」。

從二〇〇一年碩士畢業至今，我的問學之路已經走過整整十年。這本小冊子，不妨算作對我第一個「學術十年」的小結。這些文字儘管顯得非常稚嫩，每一篇卻無不飽含著我對學術的熱情與真誠。接下來，惟願自己能夠在周圍師友的教導鼓勵下，以勤補拙，以一種嶄新的風貌，開啟下一個「學術十年」新的征程！

周春健

2011年7月1日於廣州祈樂苑

補記

今年暑期在臺灣中研院文哲所訪學期間，與林慶彰先生聊天時偶爾提及拙稿的出版事宜，慶彰先生慷慨允諾可以推薦給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令晚學感動不已！慶彰先生公心大度，提携後進，令人敬仰！

2011年9月23日又及

目次

題記／周春健	1
一 《左傳》引《詩》辨析	1
二 「賦詩」源流小考	73
三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指瑕一則	77
四 朱熹與《爾雅》	83
五 元代易學著述編年	95
六 元儒吳澄與《中庸》三題	145
七 簡朝亮與《孝經集注述疏》	163
八 《漢志》「出、入、省」與班固的學術觀	169
九 讀《四庫總目》小劄	183
十 張舜徽先生《四庫提要》批評條辨 ——《四庫提要敘講疏》讀劄	195
十一 《續修四庫提要·經部》指誤一則	233
十二 從徽州到漢口 ——由《紫陽書院志略》看漢口紫陽書院的創建與影響	235
十三 《古史辨》第三冊〈自序〉讀劄 ——兼論今日對待《詩經》之態度	251
十四 《四庫總目》「四部關係論」四題	287

《左傳》引《詩》辨析

提要

《左傳》引《詩》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和文化現象，它最早、最系統地反映了春秋時期《詩》的文本面貌和流傳情況，具有獨特的文化意義和學術價值。前人的研究較多關注靜態的《詩》，對動態的引用行為本身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便忽略了《左傳》引《詩》作為引用活動最本質的特徵，因而不能客觀全面地認識和把握這一學術現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文獻學和語言學的觀點，以引用活動為觀照對象，將《左傳》引《詩》放置到中國學術的大背景下，對其包含的範圍進行了重新界定，對它的發生、格式、功用作了系統全面的考辨和析理，並從文獻學、闡釋學和學術史的角度考察了這一活動的學術價值。本文在努力還原一個《左傳》引《詩》本相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它在學術史上的特殊意義。

一 引言

（一）《左傳》引《詩》概說

《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樂歌總集，它以樸素的語言與手法，真實地反映了西周到春秋五百年間廣闊的社會生活，對中國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一度受到中國儒家的極度推尊，在漢代最早被列入「五經」，並被今文經學家推為「六經」

之首¹，成為經學時代極為重要的思想統治工具。《詩》在春秋時代就為人們熟知並廣泛引用了，《左傳》和《國語》兩部文獻較早、較系統地反映了春秋引《詩》的具體情狀。《國語》引《詩》的數量遠不及《左傳》，而且品目不如《左傳》豐富，並與《左傳》引《詩》內容有所重複。日本學者小島祐馬稱：「《詩》在諸經之中，其被引於《左傳》者為最多。」²

據筆者統計，《左傳》十八萬餘言，言《詩》之處凡二七七條，涉及《詩》一五二篇；其中可以劃歸引《詩》範疇的共二五五條，涉及《詩》一三二篇。所以言「涉及」，是因為所引詩句與詩篇或詩篇與國別並非一一對應關係，其中有六處所引同一詩句在不同的兩篇詩中均可以找到，它們是：

1. 襄公二十五年所引「我躬不說，遑恤我後」，分別見於〈邶風·谷風〉和〈小雅·小弁〉；
2. 襄公二十九年所引「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分別見於〈小雅·四牡〉和〈小雅·采薇〉；
3. 襄公三十一年所引「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分別見於〈大雅·抑〉和〈魯頌·泂水〉；
4. 昭公元年所引「無競惟人」，分別見於〈大雅·抑〉和〈周頌·烈文〉；
5. 昭公十年所引「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分別見於〈小雅·正月〉和〈大雅·瞻印〉；
6. 襄公二十六年所引「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分別見於〈大雅·抑〉和〈周頌·烈文〉。

¹ 今文經學家排列「六經」的次序是：《詩》、《書》、《禮》、《樂》、《易》、《春秋》。

² 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春秋三傳類·左傳引經考證》（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236。

另外，定公十年郕駟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即〈揚之水〉，在今詩〈王風〉、〈鄭風〉和〈唐風〉中均有之。我們無法判定《左傳》所引詩句到底屬於哪篇、詩篇到底屬於哪國，只好作不同篇目處理。

（二）《左傳》引《詩》研究綜述

《左傳》引《詩》研究並不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晉代杜預作《春秋左傳集解》六十卷，創筆路藍縷之功。以二十世紀為界，《左傳》引《詩》研究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現代之前主要做了這樣幾項工作：

第一，對《左傳》所引具體詩句的取義有所闡說，這主要保存在《左傳》的某些解釋性著作中。《春秋左傳集解》作為「現存最早的《左傳》注全帙」³，既是發端之作，又是最完備者。闡說詩句取義的代表性著作還有：（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元）程端學《三傳辨疑》、（明）陸粲《左傳附注》、（明）傅遜《春秋左傳屬事》、（清）張尚瑗《左傳折諸》等。

第二，對《左傳》引《詩》有裒集之功。宋人李石「以《左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闡論之，以蘄合於斷章取義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條，名曰《詩如例》」⁴；（清）顧棟高作《〈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錄「賦詩」二十八例；（清）嚴虞惇作《經傳雜說》，錄《左傳》引《詩》二十八例；（清）阮元作《詩書古訓》六卷，將《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

³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39。

⁴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一》（北京市：中華書局，1965年），頁245。

經中引《詩》《書》為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⁵，其中引《詩》占四卷，《左傳》引《詩》大多被錄。

第三，對引《詩》通例和功用等有所總結。杜預曾說：「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⁶。又說：「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⁷；（明）何良俊認為：「《左傳》用《詩》，苟於義有合，不必盡依本旨，蓋即所謂引申觸類者也。」⁸杜、何二氏總結的都是《左傳》引《詩》取義的通例。（宋）王柏、（清）顧棟高及勞孝輿等均以為賦詩可以「觀志」，這是總結《左傳》引《詩》的功用。

第四，利用《左傳》引《詩》推考《詩》的原始形態及其在春秋時代的流傳。（元）馬端臨根據《左傳》所載列國聘享賦詩駁「鄭風淫」之說，（明）朱朝瑛、（清）毛奇齡、嚴虞惇、朱彝尊等積極響應；（清）趙翼詳細考察《左傳》引《詩》，駁「刪詩」說，辨「古詩三千之非」；（清）勞孝輿作《春秋詩話》，把《左傳》言《詩》分為「賦」、「解」、「引」、「拾」、「評」五類，條分縷析，對春秋時代《詩》的應用流傳多所探索，並有精辟之論。

二十世紀的《左傳》引《詩》研究，較以往完成了如下幾點超越：

第一，不再限於以往隨文注釋性地闡說，開始有意識地把《左傳》引《詩》當作「詩學」或「左傳學」中的一個獨立專題來研究，

⁵ （清）阮元：《詩書古訓·序》，《叢書集成初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冊0261。

⁶ （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隱公元年》（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10。

⁷ （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僖公二十三年》，前揭，頁338。

⁸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年），卷之二，頁12。

並湧現出相關論文數十篇，實現了《左傳》引《詩》研究由簡單的價值評判到理論層次的提升。

第二，把「《左傳》引《詩》研究」從依附於泛言「春秋引《詩》研究」的狀態下剝離出來，將視線匯聚到《左傳》這一部文獻上，出現了題目中明確限定「《左傳》引《詩》」研究的專題論文十餘篇，譬如李競西的《左傳引詩研究》、束有春的《左傳引詩探微》、李世耕的《左傳引詩的幾個問題》、潘萬木的《左傳引詩類輯》、王化鈺的《春秋左傳引詩考略》以及臺灣奚敏芳的《左傳賦詩引詩之研究》等。

第三，開始從語言學、闡釋學、文化學、音樂學、傳播學等前所未有的新角度審視《左傳》引《詩》，這既表明了研究者視野的逐步走向開闊，又表明了《左傳》引《詩》研究正逐漸完成著對傳統經學束縛的跳脫。

第四，以《左傳》引《詩》為觀照對象，推考《詩》在春秋時代的地位、功能及流傳情況，結論超越前人，初步還原了一個春秋時代《詩》的本相。代表論文（或著作）有：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朱自清《詩言志辨》、董治安《從〈左傳〉、〈國語〉看「詩三百」在春秋時期的流傳》、王昆吾《詩六義原始》等。

（三）問題的提出

儘管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開始對《左傳》引《詩》進行研究，儘管這項研究已經得出了一些較為公允的結論，但今天仍有繼續研究的必要和價值。

一者，我們研究的是《左傳》引《詩》，但引《詩》到底包含哪些內容歷來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沒有統一的認識。譬

如「賦詩」，究竟是歸屬於引《詩》，還是與引《詩》並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是《左傳》引《詩》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個問題不明了，勢必影響以後的結論。

二者，歷代學者較多關注的是《左傳》所引之《詩》，對「引用」行為本身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換言之，學者們較多關注的是靜態的《詩》，而不是動態的《詩》的「引用」。而引用恰恰是《左傳》引《詩》作為一種語言現象最本質的特徵，忽略了它，無異於捨本逐末。

三者，《左傳》記述的固然是春秋間事，但它畢竟是成書於春秋、戰國之交的一部文獻⁹，《左傳》引《詩》與春秋引《詩》不能等同。以往的《左傳》引《詩》研究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了《左傳》記事所發生的春秋時代，而沒有很好地審視略晚其後的《左傳》這部文獻，這便疏漏了《左傳》作者引《詩》這一部分重要內容，而且無法探求《左傳》引《詩》作為文獻引用的特殊性。

鑒於以上幾點，本文試圖運用文獻學和語言學的觀點，以引用活動為觀照對象，對《左傳》引《詩》的範圍、發生、格式、功用、貢獻等作系統全面的考辨和析理，在努力還原一個《左傳》引《詩》本相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它在學術史上的特殊意義。

二 《左傳》引《詩》範圍的界定

研究《左傳》引《詩》，首先要明確《左傳》中哪些是引《詩》，哪些不是引《詩》。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引」字該如何理解，這就自然牽涉到了引用理論問題。因此，《左傳》引《詩》不單純是一個傳統的經學命題，它又是一個語言學命題。

⁹ 依今人楊伯峻、徐中舒等說。

引，即引用。所謂引用，是指為了一定的表達目的，對先前已有的他人或自己的言語或文獻進行引取的活動。引即是用，用緣引而來。既然是引取，那就不同於其他的呈現方式，其中有一個對言語或文獻利用的過程。界定引用範圍的分歧由此而生，判定一種語言現象是否屬於引用，關鍵也就要看這一語言現象的發生是否具備這種特殊的引取之用。

根據表現形態的不同，《左傳》兩百七十七條言《詩》可以分為如下六類：一曰「賦詩」，二曰「誦詩」，三曰「歌詩」，四曰「言語引詩」，五曰「作詩」，六曰「泛稱詩」。其中「賦詩」、「誦詩」、「言語引詩」皆屬引《詩》；「歌詩」的一部分屬於引《詩》，一部分不屬引《詩》；「作詩」和「泛稱詩」則皆非引《詩》。

（一）「賦詩」、「誦詩」皆屬引《詩》

1. 「賦詩」屬於引《詩》

我們首先要對《左傳》中的賦詩作一範圍上的限定。賦詩這個概念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賦詩包括「誦詩」和「歌詩」在內，狹義的賦詩則專指被冠以「賦」字的宴享聘盟場合中的《詩》的賦答活動。因「誦詩」、「歌詩」與狹義的賦詩在發生機制上終究還有不同，而這些不同直接關係到三者是否屬於引《詩》，或雖同屬引《詩》而又有差異，因此有必要把它們區分開來。本文所言《左傳》「賦詩」均取其狹義。

賦詩的場合，董治安先生總結為「聘」（周王與諸侯或諸侯與諸侯之間派專使訪問）、「盟」（一般為諸侯間訂立協議的盟會）、「會」

(一般為諸侯、大夫政治性的聚會)、「成」(相互議和)等多種¹⁰。賦詩的主體不是單一的，顧頡剛先生說：「賦詩是交換情意的一件事，他們在宴會中，各人揀了一首合意的樂詩叫樂工唱，使得自己對於對方的情意，在詩裏表出；對方也是這等的回答」¹¹，並且進一步指出，「那時人賦詩，樂工『一唱三歎』的歌著，用不到自己去唱，正像現在人的點戲」¹²。顧氏顯然以為直接歌唱的是樂工，而不是指命他們的諸侯或公卿大夫等當事人。朱自清先生在《經典常談》中所持觀點與顧氏毫無二致。其實未必盡然，直接賦詩者到底為誰，要看當時的具體環境，不能一概而論。有些賦詩偏重於娛樂，目的是營造氣氛，密切感情，這與「點戲」有著很大的共同之處，要「樂工」歌唱的可能性大一些；有些賦詩偏重於政治，目的是完成政治談判或國事請求等，尤其是節奏或氣氛比較緊張時，則很可能是由當事人親自來歌唱。雖然樂工和當事人並不一定在每一次賦詩過程中都同時出現，但就整個賦詩活動來講，他們應當同屬於賦詩主體。

至於春秋賦詩的具體情狀，我們已難以確知，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賦詩必定離不開音樂，因為春秋時代詩、樂是合一的，《詩》之所錄全為樂歌。孔子就曾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¹³，墨子也說：「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¹⁴因此，《左傳》所記賦詩絕大部分是合樂而歌的，即在一定樂器的伴奏下賦《詩》的某篇或某章；也有不用

¹⁰ 董治安：〈從《左傳》、《國語》看「詩三百」在春秋時期的流傳〉，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濟南市：齊魯書社，1994年），頁2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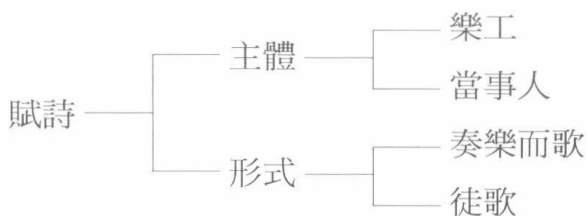
¹¹ 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載《古史辨》（上海市：樸社，1935年），第3冊，頁328。

¹² 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前揭，頁333。

¹³ 《論語·子罕》。

¹⁴ 《墨子·公孟》。

樂器伴奏的，比如襄公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前線陣地，大軍浩蕩，一場惡戰即將爆發，很難想像還有樂工相隨營中，穆子賦詩言志也很難說有樂器伴奏，倒極有可能只是合於一定樂譜的徒歌。由此，《左傳》賦詩便有了這樣兩類主體和兩種形式：



或許又有這樣的疑問：《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¹⁵意思是「賦」皆「不歌」，而《左傳》賦詩明明都是在「歌」，這豈不是矛盾？回答是否定的。我們說，班固所言之「賦」與《左傳》賦詩之「賦」，是指不同的兩個概念。首先，「不歌而誦」的對象十分寬泛，不單是指《詩》，因此「登高能賦」泛指一種文學能力或素養，與《左傳》中所記述的宴享場合的賦詩是根本不同的兩碼事。其次，《左傳》賦詩之「賦」在春秋時代具有特定的含義，它不同於戰國延至漢代的「辭賦」這種文學體裁，也不同於後世泛指的「創作詩篇」。應當說，「賦」的這種含義是後起的，大大晚於春秋賦詩。

那麼《左傳》賦詩究竟是不是引《詩》呢？這就要看每一處賦詩是否對先前已有的《詩》有引取行為的發生。從《左傳》賦詩的實例

¹⁵ 《漢書·藝文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62年），頁1755。